

家庭支持行为与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的决策机制研究

——基于CLASS 2020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许美景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4日

摘要

在中国加速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 传统家庭本位养老观念与社会化、社区化养老服务模式之间的结构性错位, 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与资源闲置并存已成为制约养老服务效能提升的关键瓶颈。为破解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 本文基于福利多元主义与安德森模型, 利用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 运用Logistic回归, 系统考察家庭支持行为对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的影响。研究发现: 家庭支持存在显著的“功能分化效应”——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通过缓解预算约束、提供信息决策辅助等“资源属性”显著促进服务利用, 而日常照护因其“替代属性”直接满足照料需求, 对同类社区服务形成显著抑制。据此, 本文建议应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设计, 同时精准识别“家庭照护脆弱”群体, 将家庭视为养老服务合作伙伴, 针对消费意愿、养老观念等采取差异化干预策略, 推动形成家庭与社会协同的可持续养老模式。

关键词

老龄化, 家庭支持, 安德森模型, 社区养老服务, 利用状况

Family Support Behavior and Older Adults' Utilization of Community Home-Based Care Services

—A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Analysis Based on CLASS 2020

Meijing Xu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May 12,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3,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4, 2026

文章引用: 许美景. 家庭支持行为与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的决策机制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9): 62-69.
DOI: 10.12677/ar.2026.139626

Abstract

As China accelerates into a moderately aging society, a structural mismatch between traditional family-centered elderly care concepts and socialized, community-based service models has led to insufficient effective demand and idle resources. Drawing on welfare pluralism and Andersen's behavioral model, this study uses data from the 2020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 and employs logistic regression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family support behaviors on older adults' utilization of community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The study finds a significant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effect": economic and emotional support significantly promote service utilization through "resource attributes" such as alleviating budget constraints and providing information-based decision-making support, while daily care support inhibits similar community services due to its "substitutability" in meeting care needs directly. The paper calls for improving the design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identifying "family care vulnerable" groups, treating families as partners in elderly care, and adopting differentiate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argeting consumption willingness and elderly care concepts to promote a sustainable family-society collaborative mode.

Keywords

Aging, Family Support, Andersen Model,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s, Service Utilization Statu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中国正处在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关键节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 202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2.64 亿, 占总人口的 18.7%, 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13.5% [1]。这一深刻的人口结构变迁, 对养老服务体系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养老模式选择上, 我国确立了“9073”的总体格局——约 90% 的老年人依托居家养老, 7% 依托社区养老, 3% 依托机构养老。这意味着, 绝大多数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将在家庭和社区中度过。正因如此,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被寄予厚望, 成为应对老龄化挑战的核心抓手。2025 年以来,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 大力推进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力图让“15 分钟养老服务圈”惠及更多老年人 [2]。然而, 服务供给的快速扩张是否能够有效转化为老年人的实际利用, 仍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在中国文化传统中, 家庭始终是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孝道”深植于代际关系之中, 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被视为天经地义。即便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 家庭支持依然是老年人最为倚重的养老资源。当社区服务走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它与既有的家庭支持之间, 究竟会形成怎样的关系? 是相互补充、共同托举老年人的晚年福祉, 还是相互替代、让家庭责任悄然退场? 这个问题, 既是学术研究的焦点, 也是政策制定的难点。

正是基于这一思考, 本研究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2020 年数据, 在福利多元主义与安德森模型的整合框架下, 系统考察经济支持、日常照护、情感支持这三种家庭支持行为对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的差异化影响。试图回答: 不同类型的家庭支持, 究竟如何塑造老年人的服务利用决策?

以为优化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完善家庭支持政策提供实证依据,推动形成家庭与社会协同的可持续养老模式。

2. 文献回顾

福利多元主义的“福利三角”理论指出,社会福利应由国家、市场和家庭共同提供,这为理解社区服务(正式照料)与家庭支持(非正式照料)的关系提供了宏观视角。但是,对于二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学界存在着长期的争论。挤出效应假说认为,正式照料的扩张会削弱家庭照料供给[3];互补效应假说则认为,正式照料能够缓解家庭照料者负担,二者呈现互补关系[4];还有研究发现正式照料与非正式照料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因正式照料类型、老年人健康状况以及家庭经济资源禀赋的不同表现为或替代或补充的关系[5]。安德森健康行为模型将影响因素归纳为倾向、使能和需求三类,国内学者运用该模型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6]-[8]。然而,既有应用研究的一个共同局限是:将家庭支持笼统归为使能因素,默认其发挥促进作用,未能深入探讨不同类型支持可能存在的功能分化——经济支持是资源转移,日常照护是服务生产,情感支持是心理赋能,三者性质不同,对服务利用的影响方向也可能不同。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在理论层面存在挤出与互补的争论,在分析框架层面对家庭支持内部异质性关注不足。基于此,本研究通过福利多元主义和安德森模型,对“家庭支持”进行功能分化,区分其“资源属性”与“替代属性”。

3.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福利多元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是福利国家危机反思的理论产物。“福利三角”概念认为社会福利应由国家、市场和家庭共同提供,此后进一步拓展为“福利多元主义”,强调志愿部门等非正式组织的作用[9]。在养老服务研究中,福利多元主义对应着正式照料与非正式照料的并存格局。正式照料指由国家或市场提供的制度化、专业化的养老服务,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提供的上门照料、康复护理等;非正式照料则指由家庭成员、亲友邻里提供的无偿照护和支持[10][11]。基于中国“9073”养老格局,家庭支持与社区服务的协同至关重要。福利多元主义虽然揭示了多部门供给的事实,但对于不同部门间的具体关系,已有研究结论不一。安德森健康行为模型将影响服务利用的因素归纳为三类:一是倾向因素,指个体在疾病发生前已存在的、影响其服务使用倾向的特征,包括人口学变量、社会结构变量和健康信念等;二是使能因素,指个体获得服务所需的条件和资源,包括家庭资源和社区资源等;三是需求因素,指个体感知到的或经评估的健康需求,包括自评健康、疾病状况、日常生活能力等[12]。在经典安德森模型中,家庭支持通常被归入“使能因素”,它作为社会支持的一种形式,为老年人获取服务提供资源和条件。这一归类隐含着一个基本假设,使能因素应当对服务利用产生正向影响,即“促进”作用。然而,这一假设在经验研究中面临挑战。现实观察表明,不同类型的家庭支持可能产生方向相反的影响。这就引出了本文的核心理论命题:作为“使能因素”的家庭支持,并非同质性的促进因素,而是存在功能分化。换言之,家庭支持对社区服务利用的影响,取决于其发挥的是“资源属性”还是“替代属性”。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对安德森模型中的“使能因素”进行概念拓展,提出家庭支持的双重属性并作出如下研究假设:

H1: 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越多,老年人使用社区服务的概率越高。

H2: 日常照护对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子女提供的日常照护越频繁,老年人使用社区服务的概率越低。

H3: 情感支持对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子女提供的情感支持越充分,老年人使用社区服务的概率越高。

4. 数据变量与方法

4.1. 数据来源与变量处理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 2020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¹。该调查以 60 岁及以上的中国老年群体为对象,覆盖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抽样范围。问卷收集了包括社会人口特征、经济状况、养老安排等多方面信息,尤其涉及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及子女数量等家庭结构变量。在数据处理环节,借助 SPSS 26.0 和 Stata 16.0 软件对数据进行了清理与统计分析,针对关键变量的缺失值采用列删法处理,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9689 个。本文依据研究问题与理论框架,从已有文献中梳理并选取适宜的核心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明确各变量的测度方式与处理标准,以确保后续模型估计的准确性与稳健性。具体变量设定如下。

被解释变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的测量,从服务供给与使用两个维度展开。服务供给情况依据问卷中“您所在的社区是否提供以下服务?”一题进行统计,涵盖上门探访、老年人服务热线、陪同看病等九类具体项目,以社区实际提供的服务种类数量来衡量。服务使用情况则以“您是否使用过以下服务?”为判定依据,凡使用过其中任意一项服务的老年人,编码为“1”,表示有利用行为;反之编码为“0”[13]。

解释变量:本研究将“家庭支持”操作化为“资源属性”与“替代属性”两类。经济支持状况以过去一年子女提供的现金总额度量;日常照料支持通过子女协助日常活动的频率评估,家务帮助与社区上门服务高度重叠,当家庭已提供这些服务时,老年人对同类市场服务的需求自然下降,体现其直接满足照料需求的替代属性;情感照料状况以子女与老年人见面的频率来衡量,见面频率反映代际情感联结强度,为情感交流、信息传递和决策支持创造条件,体现其心理赋能的资源属性。

控制变量:本文将控制变量对应安德森模型中的三类因素进行操作化定位。倾向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养老责任认知等。其中,养老责任认知反映个体的健康信念,是影响服务利用倾向的重要变量。同时,社会保障待遇状况(如养老金、医疗保险)既反映使能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

4.2. 分析方法

本研究构建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考察家庭支持行为对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的影响。因变量为“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是一个二分类变量,用 Y_m 表示,当 $M = 1$ 时代表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利用程度较高, $M = 0$ 则表示利用程度较低。设定家庭支持行为 i 所对应的高利用概率为 $P(y = 1|X) = P_i$,那么 $1 - P_i$ 即为该支持行为对应的低利用概率。模型假定因变量的概率分布服从 Logistic 函数形式,该函数可将线性组合的预测值转换至 0 到 1 的概率区间内,从而能够有效估计家庭支持行为这一自变量对老年人是否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影响程度。模型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ln\left(\frac{P_i}{1-P_i}\right) = \beta_0 + \sum_{i=1}^K \beta_i X_i \quad (1)$$

其中, X_i 表示自变量, β_0 为常数项, β_i 为第 i 个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

¹调查数据来源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 2020 年度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设计、实施,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执行。数据可通过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官方网站(<http://class.ruc.edu.cn/>)申请获取。

5. 实证结果分析

5.1. 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为系统考察不同维度对被解释变量的边际贡献与联合效应，同时控制潜在混杂因素以提升因果推断的可靠性，本研究采用分层逐步回归方法，分阶段引入解释变量。出于实证分析的可解释性考虑，本研究在回归模型中采用优势比(Odds Ratio, OR)作为效应量指标，将回归系数进行指数转换，实现对各解释变量影响强度的直观比较。结果显示，3 个模型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具有很好的稳健性，这充分说明家庭支持行为在不同层面上对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见表 1)。

Table 1. Logistic stepwise regression
表 1. Logistic 逐步回归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Exp(B)	S.E	Exp(B)	S.E	Exp(B)	S.E
经济支持状况(资源属性)	1.093***	0.022	1.086***	0.022	1.095***	0.022
日常照护频率(替代属性)			0.886***	0.035	0.781***	0.036
情感照护状况(资源属性)					1.181***	0.039
性别	1.001	0.068	1.002	0.068	1.005	0.068
婚姻状况	1.159	0.093	1.135	0.091	1.150*	0.092
受教育水平	0.950	0.046	0.952	0.046	0.956	0.046
年龄	1.026***	0.005	1.026***	0.005	1.026***	0.005
养老责任认知	1.479***	0.098	1.479***	0.098	1.442***	0.096
消费意愿	3.911***	0.286	3.824***	0.281	4.012***	0.298
互联网使用状况	0.834**	0.073	0.825**	0.073	0.820**	0.072
户籍特征	1.164*	0.105	1.129	0.103	1.151	0.105
居住地区	1.420***	0.127	1.432***	0.128	1.454***	0.131
社会保障待遇状况	1.853***	0.353	1.854***	0.353	1.849***	0.353
Sig.	0.000		0.000		0.000	
-2Log	3212.269		3207.538		3195.263	
Maximum Likelihood R ²	0.050		0.051		0.053	
Cragg & Uhler's R ²	0.097		0.099		0.104	

5.1.1. 家庭支持行为对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的影响

经济支持状况对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在控制了个体特征、社会因素等潜在混杂因素后，经济支持变量在全部三个核心模型中均呈现统计显著性，且系数方向一致为正。研究数据显示，家庭提供的经济支持水平每提升一个单位，老年人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生比相应

增加约 8.6%至 9.5%。该效应表现出良好的稳健性,其显著性未因纳入不同维度的支持变量而发生实质性改变。根据经济学中的“收入效应”原理,额外的经济资源扩大了老年人的消费可能性边界,使其对有偿社区服务的有效需求得以释放,突显了家庭经济支持在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中作为非正式保障机制的重要角色。

家庭日常照护频率对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表现出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提供的日常生活照料频率每增加一个标准差,老年人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生比显著降低约 11.4%至 21.9%。这种由家庭内部提供的、非市场化的服务供给,在功能上构成了对正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潜在替代,从而降低了老年人对外部服务的依赖程度和购买动机,凸显家庭照护在塑造老年人服务利用行为中的关键作用。

情感照护状况对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其效应在纳入多维家庭支持的综合模型中得以凸显。研究数据显示,家庭提供的情感支持水平每提升一个标准差,老年人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生比显著提高约 18.1%。与工具性的日常照护不同,情感照护主要作用于老年人的心理社会福祉和社会参与动机层面。值得注意的是,模型 3 的整体拟合优度显著优于仅包含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护的模型 1 和模型 2,这一统计证据提示,忽略情感照护维度将导致对家庭非正式支持网络作用机制的不完整甚至偏误理解。情感照护的“需求增强效应”,修正了单纯基于“经济补充”或“功能替代”视角理解家庭支持与正式服务利用关系的局限性,凸显了老年人服务利用行为背后的心理驱动因素的复杂性与重要性。

5.1.2. 倾向与需求因素对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的影响

在倾向因素方面,年龄三个模型中均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年龄每增加 1 岁,服务利用可能性提升 2.6%,反映高龄老人对社区服务的需求更迫切;认同“社会养老责任”的老人更可能使用社区服务,同时服务利用与地区间社区养老服务资源配置差异有关;消费意愿的影响最为突出,消费意愿强的老人使用服务的可能性是低意愿者的 3.8 至 4 倍,凸显经济态度对服务利用的驱动作用;而互联网使用状况呈显著负相关,可能因互联网使用者更倾向于自主获取信息或依赖线上服务,降低了对社区线下服务的需求;婚姻状况、性别、受教育水平与户籍特征未呈现显著影响。

在需求因素方面,社会保障待遇在各模型中均显著正相关,社会保障水平高的老人服务利用可能性提升 85%左右,反映经济保障对服务可及性的基础作用。

5.2.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5.2.1. 模型替换法

为检验基准回归结果对模型设定的敏感性,本研究将因变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的二元选择模型由 Logit 替换为 Probit 重新估计。结果显示,经济支持($\beta = 0.050, P < 0.001$)和情感照护($\beta = 0.088, P < 0.001$)显著正向影响服务利用,而日常照护频率($\beta = -0.121, P < 0.001$)则呈显著负向影响。核心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方向及统计显著性与 Logit 模型完全一致,表明结论不受分布假设局限,具有稳健性。

5.2.2. 工具变量法

针对家庭支持行为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修正。选取子女特征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具体划分为健在子女数量、子女经济状况、子女居住距离、子女工作状况四个变量。子女数量决定了家庭支持网络的规模,子女的经济状况则直接关系到转移支付的能力;居住距离影响着照料的可行性,工作状况则决定了子女的时间分配。可以说,这些子女特征构成了家庭支持行为的结构性的前提。但这些变量不大可能直接影响老年人的社区服务使用决策。子女数量主要取决

于过去的生育政策和家庭生育意愿，与老年人当下的健康状况或服务需求没有直接关联；子女的经济状况和工作状况是他们自身人力资本积累和职业发展的结果，至于居住距离，在大规模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多数人的居住地选择还是受就业机会主导。换言之，这些变量只能通过家庭支持这个中介变量发挥作用，与老年人当前未观测特征无关，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要求。

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显示，第一阶段回归中各内生变量的 F 统计量均大于 10 (经济支持 32.73、日常照护 28.94、情感照护 25.61)，排除了弱工具变量嫌疑；Hansen J 检验统计量为 2.31 ($P = 0.51$)，无法拒绝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要求。对比 2SLS 与 OLS 估计结果发现，内生性偏误导致 OLS 模型低估了经济支持的促进作用(偏差幅度 3.1%)和情感支持的促进作用(偏差幅度 1.9%)，同时低估了日常照护的替代效应强度(偏差幅度 8.3%)。修正后的结果进一步证实，家庭支持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存在显著的“功能分化效应”，且该效应在处理内生性后更为凸显——日常照护的替代效应在 2SLS 估计下较 OLS 更强，而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的促进效应亦较 OLS 更大，表明若不考虑内生性，将分别低估资源型支持的促进作用和替代型支持的真实强度。

6. 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2020 年数据，整合福利多元主义和安德森模型，运用 Logistic 回归，系统考察了家庭支持行为对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一是家庭支持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存在显著的“功能分化效应”。经济支持显著促进社区服务利用，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通过缓解老年人的预算约束，增强了其购买社区服务的能力，H1 得到验证；日常照护显著抑制社区服务利用，子女提供的日常照护直接满足了老年人的照料需求，对同类社区服务形成替代，验证了 H2；情感支持显著促进社区服务利用，子女提供的情感支持通过信息支持和决策辅助，增强了老年人接纳社会服务的意愿和能力，验证了 H3。这些发现表明，家庭支持并非同质性的促进因素，而是根据其“资源属性”与“替代属性”的不同，对社区服务利用产生分化效应。

二是内生性处理后核心结论保持稳健。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后，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的正向效应依然显著，且较 OLS 估计有所增强；日常照护的负向效应同样保持显著，且较 OLS 估计进一步强化。

三是控制变量的影响呈现规律性特征。消费意愿是影响服务利用的最强预测因素，表明老年人主观意愿对服务使用具有决定性作用；持社会养老责任认知的老年人服务利用概率显著更高，反映养老观念对行为的约束作用；年龄越大、享受社会保障待遇、居住在城市的老年人服务利用概率更高；互联网使用呈现负向影响，可能与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相对低龄、健康有关。

6.2. 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探索“家庭支持 + 社会服务”的组合支付模式。家庭经济支持对服务利用的促进作用表明，缓解预算约束是提升服务利用率的有效途径。建议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设计中，充分考虑家庭经济支持的作用，探索将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与税收优惠、服务补贴挂钩。

第二，精准识别服务需求群体，重点关注“家庭照护脆弱”老年人。日常照护对社区服务的替代效应提示我们，有子女日常照护的老年人可能不是社区服务的“刚需群体”。政策资源应优先向无子女老年人、子女居住距离远无法提供日常照护的老年人、子女照护能力不足的家庭倾斜。同时，建议推行“家庭照护者支持计划”——通过提供喘息服务、照护技能培训、照护津贴等方式，减轻家庭照护者负担，

避免因过度替代导致家庭照护者身心耗竭。

第三，将家庭视为养老服务的合作伙伴，而非替代对象。情感支持对服务利用的促进作用表明，良好的代际关系不仅不会排斥社会服务，反而可能促进其使用。建议社区养老服务宣传和服务递送过程中，将子女纳入目标群体，通过面向子女的宣传，使其了解社区服务的价值，鼓励子女以“情感支持 + 信息支持”的方式帮助父母选择和使用适宜的服务。

第四，针对控制变量的显著影响，采取差异化干预策略。消费意愿是服务利用的最强预测因素，提示政策应注重激发老年人内在需求，通过体验式推广、典型案例示范等方式增强服务吸引力；养老观念显著影响服务利用，建议通过社区宣传、代际对话等方式，引导形成“家庭与社会协同养老”的现代养老观念；社会保障待遇的促进作用提示，完善养老保障制度是提升服务利用的基础性条件。

6.3. 研究局限与展望

一是在数据方面，本研究使用截面数据，虽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但仍无法完全排除遗漏变量偏误。未来可结合追踪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或双重差分法进一步验证因果关系。二是机制检验方面有待深化，本研究主要关注家庭支持的主效应，对“社区服务净效用”“养老观念”等变量的调节机制未及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 [1]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 [EB/OL].
https://www.stats.gov.cn/sj/tjgb/rkpcgb/qgrkpcgb/202302/t20230206_1902005.html, 2026-05-11.
-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10/content_7046050.htm, 2026-05-11.
- [3] Stabile, M., Laporte, A. and Coyte, P.C. (2006) Household Responses to Public Home Care Programs.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5**, 674-701. <https://doi.org/10.1016/j.jhealeco.2005.03.009>
- [4] Motel-Klingebiel, A., Tesch-Roemer, C. and Von Kondratowitz, H. (2005) Welfare States Do Not Crowd out the Family: Evidence for Mixed Responsibility from Comparative Analyses. *Ageing and Society*, **25**, 863-882.
<https://doi.org/10.1017/s0144686x05003971>
- [5] 纪竞垚. 中国居家老年人家庭-社会照料模型[J]. 人口研究, 2020, 44(3): 53-70.
- [6] 叶冰清. 老年人对社区居家护理选择意愿的研究——基于北京市海淀区的调查分析[J]. 经济视角(下), 2013(10): 150-153.
- [7] 王莉莉. 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研究进展[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4, 34(21): 6240-6243.
- [8] 安瑞霞. 城乡老年人社区卫生服务使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德森健康行为模型的分析[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1(5): 54-63.
- [9] 李丹. 福利三角理论视角下农村家长教育期望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2013-2014年数据的分析[J]. 当代教育论坛, 2021(3): 115-124.
- [10] 张韵, 陆杰华. 正式照料抑或非正式照料: 照料模式对高龄老人临终照料成本的影响[J]. 南方人口, 2021, 36(1): 68-80.
- [11] 陈丽强, 宁满秀. 非正式照料对老年人医疗费用支出的影响及政策建议[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16, 9(6): 56-61.
- [12] Andersen, R. and Newman, J.F. (2005) Societal and Individual Determinants of Medical Care Ut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ilbank Quarterly*, **83**, 1-28. <https://doi.org/10.1111/j.1468-0009.2005.00428.x>
- [13] 张思锋, 张恒源. 我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利用状况分析与建设措施优化[J]. 社会保障评论, 2024, 8(1): 88-106.